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本刊上一期「當代藝術討論」主題，一出刊就受到畫家及讀者的關注，我們希望有更多人發表意見，使討論逐步深化。近期收到的讀者來信，希望本刊在注重學術性的同時，也加強思想性和面向實際。

——編者

思想家淡出 學問家凸顯

第22期內容豐富，提出了好些問題。首先是關於當代藝術的討論，甚為重要。我以前公開說過，這個世紀好些所謂藝術品，遲早有一天要從博物館掃進垃圾堆。可惜中國好些人還在亦步亦趨地模仿不已，特別是在理論上，包括文學理論及批評等等。其次是為學衡翻案的文章，此乃勢所必至。80年代我讀過台灣出版的沈雲喬有關學衡派的研究專著一種，持論近似，材料遠為翔實，願向有興趣的讀者推薦。90年代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，學問家凸顯，王國維、陳寅恪被抬上天，陳獨秀、胡適、魯迅則「退居二線」。這很有意思，顯現出某種思想史的意義，提示的或是

人生價值、學術價值究竟何在，及兩者的複雜關係等等問題。此外，本期劉再復、劉康特別是陳來的文章都很好，頗值一讀。

李澤厚 科羅拉多(美國)

94.4.28

希望當代藝術 有更多觀眾

昨日收到貴刊四月號，很為討論當代藝術的一組文章吸引，很興奮！金先生關於「公共性之喪失」的論點是公認的，雖然許多關心藝術建設的人不用這個詞語表述。我常用「共鳴」一詞來思考這一問題，也許已暗合對公共性喪失的焦慮？有一點是一致的：那就是希望當代藝術有更多的觀眾。沒有觀眾也便沒有藝術，這本是不爭之事實，但持藝術就是陽春白雪，就是極少數人可能欣賞之觀點者眾多。這有點像本期翟學偉先生談中國「國民性」是「沙」或是「泥」各有其論據一樣。做為一個藝術實踐者，我將在自己的畫中體現我的思考。我將密切注意此類問題的討論。

劉大鴻 上海

94.4.23

文化仍需要自身 的評價體系

22期雜誌近日讀了，孫隆基、孫尚揚、賀耀夫、樊綱等文章皆不錯。我特別喜歡本期關於當代藝術的主題討論，尤其是司徒立與金觀濤的一組信件十分精彩。我很贊同這不是一個純粹的藝術領域的專業問題，而是一個具有更大覆蓋面的文化主題：如何看待文化的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問題。

隨着世俗社會的降臨和現代都市文化的崛起，大陸文化界也出現了多元的文化格局，古典的、現代的和後現代的文化同時呈現。它們各有各的價值觀、話語或藝術表現系統和接受群體。然而正如通信中所尖銳指出的那樣，在一個多元的時代，社會據以對話、溝通和交流的文化的公共性卻在日益喪失，尤其是後現代主義文化張揚價值的相對性以後，整個社會更面臨着支離破碎的威脅。當文化拒斥自身內部的評價標準時，就勢必只能以外部的評價機制——市場流行價值來確定自身，這真是文化的墮落！文化的市場化、平民化、通俗化如今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，頗有順我者昌、逆我者亡的味道。有些持相對主義價值的人十分忌諱別人的批評，以為所有的批評都是一種話語霸權，甚至將嚴肅的理性的學術批評視作是一種出自道德激情的大批判。他們熱衷於整天「解構」別人，卻容不得別人「結構」他們，這難道不是一種新的相對主義話語霸

權麼？我覺得建立哈貝馬斯所說的人類得以互相理解和溝通的公共領域，確定中性的、非價值化的、形式化的對話規則，對我們這個充滿多元色彩的當代社會來說是當務之急之事。

許紀霖 上海
1994.4.26

企盼《二十一世紀》 加強思想性

今日收到《二十一世紀》第22期，真是「喜出望外」，因我及北京許多朋友都未收到第21期，以為今後再難收到了呢！

大陸知識界狀況堪憂，犬儒主義盛行，缺乏對社會的真正關懷。因此，希望《二十一世紀》並不要辦成一個「純學術」的刊物，這種刊物大陸也能辦，並已有一些。希望能真正辦成一個「思想性」刊物。

現在學界盛行的保守主義正被一種十分可怕的「力量」所利用，許多學者卻對此渾然不覺，只陶醉在學術的精緻、精美、精細之中。實際他們所提出的學術和思想，正被一種「有力量」卻無學術、無思想的勢力，有目的地「整合」進以民族主義、國家主義為旗幟的「政綱」之中。因此企盼《二十一世紀》能有意識地在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，多發一些「這邊」不便發表的「思想」。而類似本期論「學衡」的文章，這邊已有不少，並可暢所欲言，似不必多佔《二十一世紀》的寶貴

篇幅。愚意以為，《二十一世紀》的意義和生命在於給大陸思想界一種精神的引領，而主要不是港台觀察大陸思想走向的「窗口」。

讀者 北京
94.4.30

「實用理性」並不 那麼「實用」

讀李澤厚先生的〈關於「實用理性」〉(總21期)一文，有一個明顯的感覺，即他把「實用理性」的「實用性」舉得似乎太高。如果說在〈孔子再評價〉和〈試談中國智慧〉這兩篇論文中，李先生還比較注意檢討「實用理性」的「負面性」的話，那麼，在〈關於「實用理性」〉中，他雖也不是說「實用理性」純為「正面性」，但他對「正面性」則有了更多的強調，結果是「實用理性」幾乎有了無所不能的「品格」，它不僅能開出「科學」，而且還能開出「民主」。李先生反覆申述儒學與宗教的關係，說它「不是真正的宗教」，又說它是「準宗教」；同時，說儒學不是「哲學」，又說它是「半哲學」，概念顯得混亂，令人遺憾。同時，在李先生那裏，「實用理性」被「靈活化」了，其實，儒學「實用理性」的弊病之一就是「不靈活」、「不善於變通」。李先生不同意當代新儒家「堅持想用道德形而上學為現代民主制度開闢道路」的理論，但他的「實用理性」，在認知模式上，恰恰與此具有「同構性」。我認為，「全盤西化」行不通，「全盤中化」也行不通，不是主觀願望問題，而是根本上辦不到；任

何一方如真能做到，那真是萬福了，現在只能走「合而為一」的路，再造中國「文明」了。「一種東西的用」永遠不能生出「一切種類東西的用」，「一種樹」永遠結不出「所有種樹」的果子，同樣，「實用理性」也不是「萬能」的鑰匙。

王中江 鄭州
94.4.11

他日平心再論

我受請參加有關中國大陸國家能力的討論，完全是從學術觀點着眼的，不曾動肝火，更不會像紹光兄所說的那樣去發怒。紹光兄如此看待我的評論，實出我的本意。如果我因為行文倉促，文字及語氣有冒昧之處，則請紹光兄見諒。

我仍沒有改變我在原文中的學術立場與主旨。我在原文中已經指出，我並不否認中共所控制的財力在近年來有所下降。我與王、胡一文所不同之處，在於如何引伸已有的數據。財政數據僅僅是中央—地方關係的一個層面。從財政數據而得出中國「與南斯拉夫崩潰前的經歷很相像」，我無法與原作者表示認同。有心的讀者不妨去讀原文及我的評論。

紹光兄在〈再論中國政府的汲取能力〉一文中一再指責我的評論不謹慎，在此我不想逐點與紹光兄探討，將來見面時我們可以平心再論。

楊大利 芝加哥(美國)
94.4.6